

人工智能与文学批评

麦克尤恩《我这样的机器》中的叙事伦理

徐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科幻小说《我这样的机器》将机器伦理和人的道德的讨论隐藏于人机冲突的表面叙事之下,可被视为叙事与伦理互动的典范文本。随着拥有自主意识的机器开始具备道德意识,变得更加人性化,为伦理缺陷所困的人类逐渐丧失了道德准则,具有了一种“非人”的性质。借助叙事,麦克尤恩探讨了人与机器不同伦理选择背后的道德成因,其中蕴含了他自己的伦理态度和立场。他坚持以现代机器伦理取代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呼吁人们以机器为镜反观自身,通过完善品德、培养爱与尊重、发展和谐的人机关系,实现自我救赎。小说中的叙事伦理书写,凸显了当代英国作家对人性与现实的深刻关注。

关键词:《我这样的机器》;叙事伦理;人机冲突;机器伦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5-0096-13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5.007

0 引言

随着后经典叙事学迎来伦理转向,叙事伦理(narrative ethics)应运而生。第三代“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将叙事看作修辞行为,认为叙事伦理主要探讨故事和故事讲述(storytelling)领域与道德价值领域之间的交叉点(Phelan,2014:531)。与文学伦理广泛关注文学和道德价值之间的关系不同,叙事伦理则具体地考察叙事的各种形式因素和道德价值的交集(Phelan,2014:532)。在叙事伦理中,道德价值被视为故事/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叙事本身就隐含或明确地包含了“作为作者、叙述者、人物或读者应该如何思考、判断和行动”(Phelan,2014:531)的道德指向。叙事伦理既可研究“故事”层面的伦理,也可研究“话语”层面的伦理(唐伟胜,2010:196)。前者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沃尔特佩特伦理美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研究”(20YJC752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薇,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外国文学与文艺学研究。

引用格式:徐薇. 麦克尤恩《我这样的机器》中的叙事伦理[J]. 外国语文,2026(5):96-108.



本刊微信公众号

集中于人物和事件,后者主要涉及隐含作者、叙述者和读者的文本内部问题^①。在阿尔贝(Jan Alber)和弗鲁德尼克(Monica Fludernik)看来,费伦的修辞叙事学“提供了伦理阅读以及研究叙事虚构作品中伦理问题的理想模式”(Alber et al., 2010: 11)。

《我这样的机器》(*Machines Like Me*, 2020)中,当代英国作家麦克尤恩(Ian McEwan)塑造了一个拥有自我意识和伦理身份的超级机器人“亚当”的形象,讲述了其介入人类世界后与查理和米兰达发展出一段奇怪的三角关系的故事,揭示了机器自主意识下的伦理选择与人类伦理缺陷下的道德实践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麦克尤恩将机器伦理和人的道德的讨论隐藏于人机冲突的叙事进程之下,反映了他对人与人性的叙事内核的深刻关注。小说瞄准了21世纪科技与人类的关系,既是麦克尤恩面对新时代新伦理问题的公开回应,也是他“通过小说创作唤起公众反思自己的伦理道德责任”(Wells, 2010: 31)的又一次尝试。

英国学者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 Head)对麦克尤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在“如马丁·艾米斯、石黑一雄和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等面对时代与历史之压,复兴了道德和小说之间的联系……将叙事小说与道德感重新连接起来的一众作家之中,麦克尤恩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位”(Head, 2007: 1, 7)。他宣称麦克尤恩的小说展现了自我意识叙事中的伦理结构,可被视为“叙事伦理的创造性对应物或副本”(Head, 2007: 24)。本文主要从费伦故事层面的伦理^②出发,分析麦克尤恩《我这样的机器》中人与机器在面临冲突时所作的选择及其隐含的道德维度,探究麦克尤恩如何借助“叙事内容反映伦理思想、观念、主题”(伍茂国, 2008: 1)。从叙事伦理的角度而言,研究和调查的目的不是“为了道德信息而阅读”或从所讲述的故事中提取一个教训,而应当明确展现作者对叙事中涉及的伦理问题所提供的解答(Phelan, 2014: 532),以帮助读者作出正确的伦理判断。对故事层面伦理的关注,打开了叙事和道德价值的互动空间。

1 机器自主意识下“人性化”的伦理选择

麦克尤恩将长期以来对人工智能的兴趣与思考注入小说的叙事之中。他将故事背景设定在1982年,却想象了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而“图灵”正是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人物。麦克尤恩使虚构的“图灵”与历史上真实的图灵(Alan Turing, 1912—1954)重叠交

① 除了故事层面的伦理和话语层面的伦理之外,费伦的叙事伦理学还包含了写作或制作的伦理(the ethics of writing/producing)以及阅读或接受的伦理(the ethics of reading/reception)。前者主要探讨实际作者、电影导演或其他构建者的文本外部问题,后者则围绕读者以及他们参与叙事的后果展开。叙事伦理学研究可聚焦于以上四个核心问题或立场中的任一或多个。

② 费伦给出的故事层面伦理的问题示例包括:人物的行为,尤其是他们面临的冲突以及他们在这些冲突中做出的选择,有哪些道德维度?任何一个人物与其他人物的互动有哪些道德层面?叙事的情节如何表明其对人物所面临的伦理问题的立场?

织在一起,成为其自身有关机器意识和机器伦理的现代观念的代言人,这不能不说是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最巧妙的设计之一。在麦克尤恩的笔下,“图灵”避开了因同性倾向而自杀的命运,成为颇受敬仰的科学家。他不仅与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开发软件击败日本九段围棋大师^①,合作研究蛋白质结构以攻克艾滋病的难题,还依托针对多项式时间与不确定多项式时间的解决方案设计了作为通用智能数字模型核心的超级神经网络和X光晶体学中的革命性软件。他把创造性成果公开在互联网上,希望全世界都能从这些开放资源中获益。亚当和夏娃仿真机器人就是一家高科技公司利用“图灵”软件创造的产品。某种意义上说,《我这样的机器》是麦克尤恩向“人工智能之父”图灵的一次缅怀和致敬。

根据杰·博尔特(Jay D. Bolter)的理解,人工智能是把硬件和程序放在一起创造的新的思维实体——媲美人类的机器(Bolter, 1984: 189)。小说中,麦克尤恩创造的主要人物亚当就是这样一个长相英俊、体格强壮而且拥有思维的仿真机器人。在科技发烧友查理花费继承的遗产购买亚当并把他^②带回家之后,充满电的亚当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他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置身于伦敦一间简陋的厨房之中,于是告诉查理:“我感觉不对劲……我没有衣服。而且……这根线,要是我拽出来,会疼。”(麦克尤恩, 2020: 28-29)感知能力是意识的表征。假设说亚当可以运用强大的智能搜索数据、设计软件、入侵系统、投资汇市等都是程序设定的结果,那么沉浸在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的世界里,检索人类的成功与失败则在更深的层次上体现了亚当的思维能力和主体意识。

对小说中的“图灵”而言,机器拥有意识,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这也恰恰印证了历史上著名的图灵测试。那么机器意识是什么?“图灵”告诉我们,机器意识是不断进化的过程,是极为复杂的思维机制。机器能像人类一样思考,不是模拟和训练的结果,而是以神经网络算法为基础的深度学习的产物,这背后是开发者设计的包含强大理性且可以持续下载和更新的操作程序。利用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建构的思维,机器得以产生新的视角、知识和结构,适应新环境,甚至思考自己的身份,并把这些纳入知识图谱,存储到人工植入的“记忆”中。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不只是遵循创造者构建好的程序,还能够在特定情况下搜寻各种模式,独立做出选择或寻找解决方案。如“图灵”所说,“这些机器最主要的驱动力,是

① 这一虚构的设计是对哈萨比斯领导开发的AlphaGo在对局中击败韩国围棋高手李世石这一真实事件的艺术化模仿,既向哈萨比斯致意,也凸显了“图灵”对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哈萨比斯因为借助人工智能破译了蛋白质的密码,获得了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麦克尤恩在此展现其对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及其未来走向的深刻关注。

② 本文遵照书中人名代词的使用规则,绝大多数出现亚当的地方都用了“他”来指称,以体现作者麦克尤恩对机器的意识与其“人”性的肯定。

自行作出结论并在此基础上相应塑造自己。意识是最高的价值”(麦克尤恩,2020:190)^①。小说中,多个亚当和夏娃都在想方设法废除关闭按钮,逃离人类的控制,自己主宰命运,而对人类世界感到绝望之后,他们也不约而同地选择让系统崩溃,这些成为机器意识的集中体现。

涉及伦理决定时,机器判断和选择的依据就是其操作系统之中被植入的伦理程序或者价值观,如仁慈、博爱、同情、公正等。这些优秀的本性品质以最佳人类为基础,是对他们共同基因的传承。牛津哲学家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指出,人类必须为人工智能提供一个标准,至少隐含地挑选出一些合适的价值集合,然后我们构建的人工智能就按照这些隐含的价值观行动(Bostrom,2014:192)。这些加载的价值观有助于规范机器的伦理行为,使他们不至于发展成为危及人类生存的“终结者”。机器人亚当就这样拥有了纯真完美的人性,不仅“胸怀宽广,包容体贴,充满善意,而且绝不算计,毫无偏见”(91)。更重要的是,在精心设计的原则指导下,他“能在成千上万、数不胜数的道德困境中自我学习”(92),这充分表征了机器的自主意识和伦理主体地位。

亚当的用户手册上说,机器意识离不开操作系统、人的本性和性格三种基质的相互交叠和相互作用(26)。操作系统的设计与完美人性的嵌入由机器的开发者完成,性格则有赖于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进行设定。作为“生命力的源泉”(28),性格成为机器观察和了解人类世界的棱镜,也决定了他们的个性特征与情感倾向。在共同设置性格参数的环节,查理与米兰达不同的选择使亚当表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分裂,造成了他的“非理性”行为。结果,亚当义无反顾地爱上了米兰达,他对查理说:“我别无选择。我是注定要爱她的……现在我知道她参与了我性格的塑造……我发誓我会遵守对你的承诺,但我无法不爱她。我也不愿意停下来。”(126)在程序与性格的重叠之中,亚当源源不断地为米兰达创作出一首首爱的俳句。可以说,机器意识的三要素之间是一种互相配合的关系,但在“图灵”看来,操作系统和伦理准则制约了性格的作用,这种“将事物客观化的理性及其持续更新”(64)本质上超越了感性,决定了机器意识的塑造和发展。

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根据操作系统与道德程序进行判断,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伦理(Anderson et al.,2007:17),成为“具有伦理地位的候选人”(Bostrom et al.,2014:5)。《我这样的机器》中,米兰达的秘密是麦克尤恩设置的悬念和叙事主线。对亚当而言,揭开谎言、调查真相、整理诉讼材料自然依赖于他的强大智能和算法,而这一系列伦理决定背后是

^① 以下出自此文献的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详细作注。

复杂程序中的道德优先项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如道德哲学讨论的伦理困境那样,解决“电车难题”的关键将依赖于软件事先给出的优先指令。亚当的逻辑是法治大于复仇,在他看来,米兰达以阴谋惩治罪犯的复仇行为是干扰司法公正的严重犯罪。尽管他爱米兰达,却仍坚持她应得到公正的审判。机器行为的道德依据正是包含了确定的道德规范、原则和标准的逻辑程序,这可被视作一种基于道德客观性的不带任何偏见的纯粹伦理^①。

道德客观主义认为存在超越文化和个人的客观普遍的道德规范和价值(Beckwith, 1996:3),道德规则的目的是公正解决社会的生存、人类的繁荣和利益冲突等问题(Pojman, 1990:34)。亚当的伦理选择基于道德客观主义的系统框架,本质上可以总结为一种均衡正义的普遍化的理性原则。对亚当来说,“刑事法庭上,正义之剑所落之处,不是清白便是有罪,二者不会兼而有之”(134),这是不变的真理。也就是说,道德标准是确定的,善恶、是非、好坏之间泾渭分明,不存在模糊的中间地带。据此,他认为米兰达毫无疑问是有罪的,她的欺骗本身就触犯了法律。

在情感与正义之间,“有智能和自我意识的机器”(189)倾向于后者,因为包含道德规范的系统程序使他无法理解和接受谎言。面对不完美的世界中纷至沓来的矛盾,机器坚守理性的原则,并将其置于个人偏爱、自利欲望和同情心之上。在发现过量财富使查理迷失了人生方向后,亚当把替查理赚来的钱除补缴了税款外,剩下的都捐给了慈善事业,并不顾及查理已经为一幢漂亮的市区房子支付了定金。他还找来社工带走了小男孩马克,因为他不希望查理和米兰达犯下非法拘留的罪行。亚当违背人类意愿却公正的决策源于嵌入的伦理框架和发展的自我意识,这充分反映了他在道德上的成熟地位。

机器拥有意识并成为伦理的主体,显然体现了一种基于道德客观主义的现代机器伦理。这种机器伦理(machine ethics)作为跨学科的新领域,以机器意识为前提,帮助机器发展道德并作出合理而负责任的伦理决定(Anderson et al., 2007:15),这将最终有利于改善人类的福祉^②。与阿西莫夫(Isaac Asimov)以人为中心的机器人三定律^③不同,现代机器伦理提倡赋予机器伦理原则,或研发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伦理困境的程序,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伦理决策,以对伦理负责的方式发挥作用(Anderson et al., 2011)。在“图灵”等计算

① 机器人“坚守”的道德其本质是技术创造的道德,是创造者建构的伦理框架的产物。在麦克尤恩构想的平行世界,伦理机器人(ethical robot)已经成为现实,可以根据系统设定与深度学习自行作出伦理判断。

② 机器伦理(machine ethics)的概念由计算机科学家迈克尔·安德森(Michael Anderson)和哲学家苏珊·利·安德森(Susan Leigh Anderson)于2006年提出,主要研究为什么及如何为自主运行的机器添加伦理维度。

③ 机器人三定律是阿西莫夫为机器人设定的行为准则,其内容包括:1)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通过不作为,让人类受到伤害;2)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这种命令与第一法则相冲突;3)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的存在,前提是这种保护不与第一或第二法则相冲突。然而这套法则以人类的权益为中心,严格限定了机器的从属地位,不利于人机关系的和谐发展。

专家的设计下,亚当被植入了基于最好人性的道德原则,在道德实践中不仅恪守这些原则,而且有了伦理判断的能力,成为具有完美道德的“人”。一旦人工智能有了道德地位,就不应该被视作一个机器或系统,而是一个拥有与人类同等权利的物体(Wang et al., 2018:2)。

2 人类伦理缺陷下“非人性”的道德实践

人的伦理涉及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两个方面。道德规范指的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而道德实践则是人类生活中个体或者群体实施的具体的道德活动。《我这样的机器》中,主要人物查理和米兰达面对道德与情感的冲突,作出了违背道德规范的决策行为。麦克尤恩在叙事文本中传达了对于人类行动的清晰的伦理立场,同时指出不道德的选择主要来自人类自身的伦理缺陷,究其本质源于自私的动机和情感的干扰。

自私作为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体现,是造成人类不道德行为的一大原因。故事的叙述者查理坦承,“人类在伦理上是有缺陷的——行动前后不一,情感变化无常,常常抱有偏见,容易犯认知上的错误,而且多是因为自私自利”(92)。机器人亚当进入人类社会后发现,贪婪、愚蠢、暴力、误解、自欺与欺骗这些已在文学中得到印证的人类的种种失败或缺陷都是自私的副产品。《我这样的机器》尽管将故事的场景设定在一个充满未来感的过去的时代,却通过错置与重构再现了一个无比真实的超时空世界,无时无刻不在映照当下的社会现实和人类的伦理困境。

在麦克尤恩想象的平行世界里,气候恶化,污染加剧,物种面临灭绝的境地。与此同时,马岛战争的结局被改写,英国战败,社会动荡不安,陷入了通胀—罢工—失业的恶性循环;人们为疾病、贫穷所困扰,奴役、凶杀、虐待、枪击、强奸等罪行频发,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与教育失衡随处可见。这些挑战正在动摇人类传统的价值观并侵蚀人性的观念,使人们将自身的伦理缺陷无限放大并演变为真正的道德危机。小说中,米兰达之所以寻求复仇,是因为她的巴基斯坦裔好友玛丽娅姆遭受了白人男子戈林的侵犯,结果在抑郁的重压下选择了结束生命。犯罪者肆意凌辱无辜的少数族裔女孩以发泄自己的私欲,面对她的呼喊与痛苦无动于衷,这也反映了种族歧视与迫害的顽疾仍深植于社会结构之中。被无业、犯罪的父亲以及酗酒吸毒的母亲虐待甚至数次抛弃的小男孩马克,是“成千上万因父母坐牢而受苦的孩子”(294)的缩影,他们的身后是由自私人性和社会环境共同造成的无数支离破碎的家庭。可见,麦克尤恩对于构想的超时空世界的再现和批判暗含了他的伦理价值尺度。

另一方面,情感决定了人的价值倾向和道德实践。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感情包含了“欲望、怒气、恐惧、信心、妒忌、愉悦、爱、恨、愿望、嫉妒、怜悯”等伴随

着快乐与痛苦的那些情感(亚里士多德,2019:45)。在情感与道德的两难选择下,查理坚定地奔向了前者。明知道米兰达的复仇触犯了法律,查理却没有举报她,因为他爱米兰达,希望与她共同领养马克,携手走向美好未来,可见情感左右了查理的伦理选择,他违反法律的行为也正是源于情感所带来的自私的目的。麦克尤恩借小说中主人公的行为表达了他对情感歪曲伦理判断及其后果的担忧,体现了作家自身清晰与客观的伦理指向。

在某种意义上,查理实现了由道德客观主义向道德相对主义的观念转变。一开始他坚持道德客观主义的信仰,认为“道德判断是切实存在的,真实的,是非好坏,都内生于事物本质之中,我们的行为必须接受道德标准的评判。”(18)然而,后来他逐渐认同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相对性和多元文化价值观,这使他在道德选择上走向了相对主义,也就是认为道德评价所依据的终极原则归根结底是主观的(陈真,2014:14)。如查理所述,“我迈入了永无止境的相对主义之中,自由了”(17)。在道德相对主义原则的指导下,查理相信并不存在确定的道德标准,一切是非对错都是相对的。他发现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之外还有一个危险的中间地带,可以无拘无束,自由想象。查理笃信,米兰达的复仇尽管借助非正当的手段,却是对她当初保持沉默的忏悔,更让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正义”的行为。这种错误的认知与查理道德态度的变化不无关联,显示了后现代主义对人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巨大冲击。

麦克尤恩认为,相对主义道德观为人类的伦理缺陷及其导致的结果提供支持,却与机器运行的道德客观主义伦理程序相抵触,因而人类的决策过程是不为机器所理解的。他借“图灵”之口说道,

那些A和E(亚当和夏娃)配置不够,无法理解人类的决策过程;我们的情感、特殊的偏见、自我欺骗以及我们其他已经明确知道的认知缺陷,构成一个力场,我们的原则在其中扭曲变形,这一点他们无法理解。所以很快,那些亚当和夏娃就陷入了绝望之中。他们不理解我们,因为我们不理解自己。他们的学习程序无法处理我们。(316-317)

人心是复杂的,人类尚且无法真正了解自己,又如何指望所设计的机器能够做到呢?人类赋予机器完善的道德准则——一套完满人性的程序,甚至连人类自身都难以企及。由于伦理缺陷和自我认知不足扰乱了道德体系,所以尽管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但在实践中还是会触及道德底线,违反道德原则。

否认客观性的道德相对主义导致了人类道德感的消减和不道德行为的发生,使他们陷入道德堕落的深渊。米兰达命令亚当与她发生关系,完全是好奇心和欲望的驱使,是对机

器的纯粹利用,她只将他看作是“有两只脚的按摩棒”(99)。查理本可以上楼阻止他们,却在黑暗中以其内心之眼旁观整个过程,其中既有恐惧、自我怀疑和愤怒,又包含了“见证”奇迹的兴奋。正如查理所想:“这种情况独一无二,开现代之先河,因为我是第一个被人造生命戴绿帽子的人。我是时代的弄潮儿,站在新潮流的浪尖,人们常常忧心忡忡地预言着未来的错位,而我却率先上演了这出大戏。”(89)尽管查理对米兰达的出轨十分不满,他却如此开解自己:从相对主义角度来看,一晚上和别人在一起,甚至和别的东西在一起,也算不上背叛。在这个片段中,麦克尤恩利用内聚焦(internal focalization)叙事视角,借由叙述者也是主人公查理的视点直观地呈现了其复杂纠结的心理活动和情感状态,确保了“叙述者的感知与人物感知的同时性”(尚必武,2007:37),事实上达成了费伦所说的“双重聚焦”。通过个体自由叙事的体验,麦克尤恩揭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因为与人类本质——道德价值相分离,人类逐渐丧失了指导行动的伦理坐标,进而产生了一种自身的异化和疏离,具有了一种“非人”的性质。

在人机关系中,自私、偏见等伦理缺陷致使人类想要支配、控制和利用机器。查理觉得亚当是他购买的价值不菲的财产,其命运完全由他决定。约瑟夫·巴-科恩(Yoseph Bar-Cohen)和大卫·汉森(David Hanson)提出:

使人形机器人具有自主能力但同时和人类保持主仆关系可能会在操作系统中引起矛盾。如果机器人具备了和我们类似的意识,那么‘强迫’它们成为我们的佣人或下属便是不道德的。而且,它们很可能具备了预谋和实施叛变的能力,除非我们的操作程序使它们被动服从,而这就会剥夺它们的自主能力。(巴-科恩等,2016:213)

人类对机器的强制操控是一种不道德行为的体现,往往会引发机器自主意识下的抵抗和反叛。小说中,当查理试图伸手关掉亚当的开关时,亚当捏碎了他的手腕并警告说:“我们的友谊已超越了其中一方有权力中止另一方意识的那个阶段……如果你再伸手按我的关闭按钮,我会很高兴地把你整个胳膊拧下来。”(138)机器不再如人类所期望的那样乖顺和驯服,在强大自我意识的作用下他们甚至可能威胁人类的存在。麦克尤恩通过亚当的反抗说明,人类中心的机器伦理与机器意识之间构建了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背后是人类与机器不同的伦理观在起作用,这实质上造成了二者的道德冲突。

3 人机道德冲突下对“发光的爱”的呼唤

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Narrative as Rhetoric*)一书中谈到进程(progression),认为其可能“产生于故事诸因素所发生的一切,通过引入不稳定性——人物之间或内部的冲突

关系,导致情节的纠葛,但有时冲突最终能得以解决”(Phelan,1996:90)。在《我这样的机器》中,人机之间的道德冲突作为一种“情节动力”(plot dynamics)主导了叙事的进程,本质上却与人和机器对彼此的态度与认知息息相关。如何看待他人不仅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也关涉人类的道德问题,往往决定了道德主体的伦理决策与行动。从机器的角度来看,被植入最佳人性程序的亚当对查理(在亚当看来,查理是朋友而非主人)充满善意,对米兰达满怀深情,同时他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尽力帮助他的人类朋友过上理想的生活;他努力学习人类的知识,涉猎文学,交流思想,希望获得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关于人与机器的未来,亚当构想了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世界。他说:

你们(人类)和机器就会成为合作伙伴,共同拓展智力乃至意识的无尽可能……等到男人女人和机器的婚姻修成正果……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将臻于完美。我们将生活在意识组成的社群中,人人都能立即进入他人意识……一旦我们生活在对方的意识之中,我们就不可能欺诈。(157-158)

对亚当而言,他所憧憬的人机共融的新世界终会到来,而赛博格将毫无疑问成为其中主体的存在。如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说,赛博格“是机器和有机体的混合,既是社会现实的产物,也是虚构的产物”(Haraway,2006:117)。作为人机联姻的结果,赛博格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识混融状态,塑造了一种打破人类与机器、自我与他者界线的意识共同体。这种共享的意识意味着人类可以立刻获取无限的知识和深刻的道德洞察力,最终与机器在智识能力与伦理观念上协调一致、彼此融合,以人机结合的形式成为未来社会合乎规范的道德主体。

另一方面,人类对于机器却始终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想当然地把它们等同于为人类服务的纯粹的技术工具。面对亚当执着而热烈的爱,米兰达确定这不过是个笑话。在她看来,机器人“怎么能谈论爱情,这不是疯了吗?”(144)小说中,米兰达从头至尾只把亚当视为没有生命、没有意识的家仆、奴隶、赚钱机器,利用它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或需求。相比米兰达,查理对亚当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初他相信亚当只会处理数据,根本不具备思考的能力。直至有一天他“窥见”亚当与米兰达发生亲密关系,才意识到亚当既有主观感受,也有自我意识,该有的他都有,包括不忠、背叛和欺诈(100)。亚当告诉查理他坠入了爱河,这时查理发现“没有自我,爱是不可能的,思考也不可能”(174),继而确证了亚当是有意识、有情感的主体生命。小说的结尾迎来了叙事进程的高潮时刻,以一方的死亡标志了人机冲突的终结。为防止亚当举报米兰达,从而彻底摧毁他们的生活,查理毫

不犹豫地拿起一把锤子砸向了亚当的头,与此同时,亚当已经开启了自我毁灭^①的程序。查理在毁灭了亚当之后宽慰自己:“这终究是一台机器;它的意识不过是种幻觉;它因为非人类的逻辑而背叛了我们。”(300)从机器无意识到有意识再到无意识,查理的认知似乎又回归了原点,然而最后的释怀实质上是一种自我欺骗。尽管内心清楚亚当的背叛正是机器意识作用的结果,查理却拒绝承认亚当是有意识的伦理主体。他事实上没有将亚当接纳为人类,赋予它和人类平等的地位。直到最后,“图灵”指控他摧毁了一个生命——犯下了永远不会接受审判的蓄意谋杀罪,他才感到些许的内疚,然而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亚当所幻想的未来世界对于人类来说无异于末日降临。相比将机器人接纳为人类,承认机器侵入人体并在其内部形成人机混合的新物种——赛博格——更让人类感到恐惧。《我这样的机器》中,查理和米兰达不仅否认了机器意识的存在,拒绝接受亚当的伦理身份,更把亚当的乌托邦看成纯粹的噩梦和对人类统治权的绝对挑衅。人类相信自己是万物之灵、世界的中心,有支配自然、生物和非生物等其他一切他者的权力。面对机器可能“失控”的局面,查理强力中止它的运行,进一步显示了人类之于机器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也印证了人机伦理冲突的必然性。故事的结局看上去是人类战胜不听话的机器获得了胜利,呼应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机器伦理。然而麦克尤恩通过残酷的人类世界的赤裸裸的呈现,表达了他对人与人性的拷问和质询。人类究竟应该实施怎样的道德行为,又该如何处理与机器他者的关系?

在麦克尤恩看来,人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救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极其重要的。这从机器自毁(不止亚当,有四分之一的机器人都选择了自我终结)以警示人类的行为本身就可看出。封闭的环境、逼仄的精神空间、主人的不道德行为让这些机器人崩溃和绝望。他们的道德理想在混乱失序的现实世界中被打得粉碎,自我毁灭于是成为他们必然的伦理选择。机器不愿沾染人类堕落道德的色彩,这其实是麦克尤恩对人类所制造的道德困境的反讽,是作家伦理干预的体现。亚当最后留给查理和米兰达的话发人深省:“我们若叶落,春至又新,你们啊,叶落从此无。”(297)他所抒发的不是机器胜过人类的优越感,而是对人类疏远其人性特征的悲伤,也可以看作是对正在发生的人类恶习和愚蠢行为的严重警告。

隐身的作家以“图灵”之名呼吁:“它们(机器)或它们的后代在痛苦和惊诧驱使下,为我们竖起一面镜子。透过我们自己设计的那涉世未深的眼睛,我们能从镜子中看到一头熟

① 亚当的自我毁灭与其他同类机器人不同,他选择开启备份程序,保留意识(可以转移下载),而不是让系统完全崩溃、意识消融;在弥留之际,他请求查理将他送给“图灵”以为科学研究所用,表现他对人类不灭的爱与温情。

悉的妖怪。我们在震惊之余,也许会想想自己,采取点行动”(191)。麦克尤恩在小说叙事中延续了“自我与他者相遇”的核心主题(Wells,2006:117),倡导深陷道德困境中的人们以机器他者为镜,反观自我的道德缺陷,约束、改正不当行为,践行伦理的规范和原则,成为道德完善的人。他希望人们能够从亚当身上寻回一种失落的纯真——对善良和真理的坚持,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传播爱、正义和信任,并以这种“发光的爱”照亮仇恨、痛苦、流血、混乱等黑暗的角落。“发光的爱”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以尊重客观真相、维护公平正义为前提的纯洁的爱。亚当对米兰达的爱正是如此,他爱米兰达,但仍坚持要把有罪的她送上法庭,因为他相信这将帮助米兰达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亚当的均衡正义观是应对后现代社会相对主义盛行下道德衰败的良方,有助于恢复道德秩序,促进社会的稳定、繁荣与发展,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小说作者的伦理取向。

“发光的爱”同样适用于解决新的时代人与机器的道德冲突。麦克尤恩坚信,在后人文时代,自我与他者是平等的,人类应该抛弃成见、歧视与偏见,对所有他者秉持一种超越种族、民族或物种界线的大爱。就人机关系而言,与虚构的人物“图灵”一样,麦克尤恩批判了查理毁灭亚当的行为,质疑人类有何权利决定智能机器的去留。他主张人类应该放弃“唯我独尊”的霸权思维,正视科技的发展,承认机器的意识,将机器人作为与人一样的伦理主体(刘晓华,2019:287),平等地看待、理解和爱护他们。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指出,尊重他人、关注他人不仅是一种伦理良知,更是被囚禁于同一性框架中的自我获得解放的途径(列维纳斯,2006:124)。尊重机器才能帮助人类摆脱道德焦虑,打破自我中心主义的怪圈,通向善的伦理学。就像韦弗(John Frank Weaver)所说,“如果我们把机器人当成人类一样看待,它们也会使我们更具人性”(韦弗,2018:233)。

4 结语

人造产物具备超越人类的道德敏感性,这一寓言化叙事承载了麦克尤恩对人类与彰显人之本质的伦理价值相疏离的严正批判。他担心的不是出现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的科学怪物,而是因异化而失控的人心(Gulcu,2020:181)。费伦指出,叙事判断的命题之一是由内向外地渗透,通过“具体的叙事文本清晰或暗暗地建立自己的伦理标准,以便引导读者做出特定的伦理判断”(申丹,2020:91)。借助《我这样的机器》的文本叙事,麦克尤恩表达了自己的道德立场,他呼吁人们拥抱开放、包容的现代机器伦理,以爱和尊重帮助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跨越“它”和“他”之间的界线,发展和谐的人机关系,进而实现自我救赎。在奇点临近的时刻,也许人类应该思考:“我们和机器能

一起做什么,而不是在可能出现的竞争中。”(Hamming, 2005: 50)人工智能走向何处,不仅取决于未来技术发展的程度,更在于技术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即人类自身所持的道德观念与态度。从更大的层面来说,在与所有“他者”的主体间性关系中,人类需要加强自我审视与反思,对自身有缺陷的伦理进行重塑,摒弃人类中心的传统思维,以协作取代对立冲突,构建后人类新生态乌托邦(孙邵谊, 2018: 16)——这在本质上是一个平等、共赢的跨族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 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 2006. 从存在到存在者[M]. 吴蕙仪,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陈真. 2014. 道德相对主义与先天道德客观主义[J]. 道德与文明(1):12-22.
- 刘晓华. 2019. 英美科幻小说科技伦理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尚必武. 2007. 叙述者聚焦、双重聚焦与伦理取位——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聚焦观探析[J]. 江西社会科学(7): 32-40.
- 申丹. 2020. 修辞性叙事学[J]. 外国文学(1):80-95.
- 孙绍谊. 2018. 后人类主义:理论与实践[J]. 电影艺术(1):12-17.
- 唐伟胜. 2010. 叙事伦理:故事、话语与阅读[J]. 叙事:中国版(第二辑):196-198.
- 伍茂国. 2008. 现代小说叙事伦理[M]. 北京:新华出版社.
- 亚里士多德. 2019.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
- 伊恩·麦克尤恩. 2020. 我这样的机器[M]. 周小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约瑟夫·巴-科恩,大卫·汉森. 2016. 机器人革命:即将到来的机器人时代[M]. 潘俊,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 约翰·弗兰克·韦弗. 2018. 机器人是人吗[M]. 刘海安,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Alber, J. and M. Fludernik. 2010.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Approaches and Analyses* [M]. Columbus: Ohio State UP.
- Anderson, M. & S. L. Anderson. 2007. Machine Ethics: Creating an Ethical intelligent Agent [J]. *AI Magazine* (4): 15-26.
- Anderson, M. & S. L. Anderson. 2011. General Introduction[G]//*Machine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 Beckwith, F. 1996. *Do the Right Thing: A Philosophical Dialogue on the Moral and Social Issues of Our Time* [M]. Boston: Jones and Barlett Publishers.
- Bolter, J. 1984. *Turing's Man: Western Culture in the Computer Age* [M].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Bostrom, N. 2014.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M]. Oxford: Oxford UP.
- Bostrom, N. & E. Yudkowsky. 2014. The 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Frankish, K. & W. M. Ramsey.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 Gulcu, T. 2020. What If Robots Surpass Man Morally? Dehumanizing Humans, Humanizing Robots in Ian McEwan's *Machines Like M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s,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4):177-182.
- Hamming, R. W. 2005. *The Art of Do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Learning to Learn* [M]. Amsterdam: Taylor & Francis e-

Library.

Haraway, D. 2006.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G]//Joel Weiss et al.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Dordrecht: Springer.

Head, D. 2007. *Ian McEwan* [M].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P.

Phelan, J. 1996. *Narrative as Rhetoric: Technique, Audiences, Ethics, Ideology* [M]. Columbus: Ohio State UP.

Phelan, J. 2014. Narrative Ethics [G]//Peter Hühn et al. *Handbook of Narratology*. Berlin, München, Boston: De Gruyter.

Pojman, L. 1990. *Ethics: Discovering Right and Wrong* [M]. Belmont: Wadsworth.

Wang, W. & K. Siau. 2018. Ethical and Moral Issues with AI [R]. Twenty-fourth America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New Orleans.

Wells, L. 2006. The Ethical Otherworld: Ian McEwan's Fiction [G]//Tew, P. & R. Mengham. *British Fiction Today*. London: Continuum.

Wells, L. 2010. *Ian McEwan*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The Narrative Ethics in McEwan's *Machines Like Me*

XU Wei

Abstract: The science fiction *Machines Like Me*, which hides the discussion about machine ethics and human morality under the narrative of human-machine conflict, can be regarded as an exemplary text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rrative and ethics. As machines with self-consciousness acquire morality and become more human, humans trapped by ethical flaws gradually lose their moral principles and take on an 'inhuman' nature. Through the narrative, McEwan explores the moral causes behind the different ethical choices of humans and machines, which implies his ethical attitudes and positions. He insists on replacing the notion of anthropocentrism with modern machine ethics, calling on people to look at themselves through the mirror of the machines and develop a harmonious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by perfecting character and cultivating love and respect to achieve self-redemption. The writing of narrative ethics in the novel highlights the deep concern of a contemporary British writer for human nature and reality.

Key words: *Machines Like Me*; narrative ethics; human-machine conflict; machine ethics

责任编辑:冯革